

新 月

第 二 卷 第 十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新月書店編輯部啓事

本店承國內學者不棄，常承惠賜稿件，無任感謝。長篇鉅製，寄來時務請掛號，以免遺失。并請寄至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本店不能承印時，自當璧還，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并附相當郵票，否則恕不能郵還，只得暫存敝處。

新月月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常承海內讀者惠稿，至為銘感，惟有數事奉告，尙希原諒為荷。(一)來稿請直接寄交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請勿寄交他人轉交，以免貽誤。(二)本刊收到稿件後，無論刊載與否，恕不能一一函復。(三)凡不刊載之稿，如欲寄回者，請預先注明，并附相當郵票，並請開明詳細住址，便當於最短期內璧還，否則不能照辦。(四)凡經刊載之稿，本刊略致薄酬，於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攜印鑑到本店領取，或由本店郵匯亦可，惟須請先為聲明。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版

編輯者 梁實秋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價目				廣告刊例			
全年	半年	零售	國外加郵	等次	特等	普通	通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每冊	地位	封面	封面	封面
三冊	一元六角	三冊	六分	全	五十元	四十五元	三十五元
				半			十八元
				面			十元
				四分			八元
				之一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如蒙長期訂登，折扣特別從優)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號

最新出版

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一

可欽佩的克來敦

余上沅譯並序
時昭云校

此劇爲近代英國大戲劇家巴利之傑作，久已膾炙人口，且在歐美舞台上常見重演，其價值之高，在近代劇中允稱巨擘。現經余上沅先生譯成中文，譯筆恰得原意，能達巴利之籌妙，流利傳神；極合舞台之搬演。並由時昭云先生增加校閱，張鳴琦先生作圖示景，嚴密周詳，得未曾有。是誠私人書架及演劇團演所不可不備之書也。

余先生又爲撰長序一篇，約一萬五千餘言，於巴利之生平，著作，及本劇之出處，精義，俱有簡確生動之論述。讀之不但易於瞭解本劇，即對戲劇之爲物，亦可由斯窺見端倪矣。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四版) 罵人的藝術

秋郎 著
實價三角半

生活週報第五期的「介紹好讀物」欄，對此書曾有如下
的評語：

『罵人似乎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但是如果罵得有理，在痛罵之中便寓有督促痛改的效用，在相當的限度內却也未嘗不可加以歡迎。況且這本書裏不是謾罵，乃是婉諷，還含有各式各樣的「笑聲」，所以很值得看看。全書一百三十四頁，包括四十七篇短文，雖不能說篇篇都很有精彩，但可說有許多能使你看了不能自主的對着自己發笑。』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

目錄

我們走那條路？	胡適
波特萊的散文詩	徐志摩
桐子落（獨幕劇）	陳楚淮
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	邱竹師
小品文兩篇	何家槐
一，桂花盛開的那個晚上	
二，『假使你也是女人——』	
春的投生（詩）	徐志摩

奇人及其朋友……………查士元

莎士比亞的觀眾……………梁實秋

勃來克(下)……………邢鵬舉

書報春秋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樊仲雲譯)……………梁實秋

英國文學史(林惠元譯)……………梁實秋

政治制度淺說(張慰慈著)……………劉英士

我們走那條路？

胡適

緣起

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討論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發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論才丁兩旺』（新月二卷四號），如羅隆基先生的『論人權』（新月二卷五號），都是用討論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但在分配題目的時候，就有人提議說：『在討論分題之前，我們應該先想想我們對於這些各個問題有沒有一個根本的態度。究竟我們用什麼態度來看中國的問題？』幾位朋友都贊成有這一篇概括的引論，並且推我提出這篇引論。

這篇文章是四月十二夜提出討論的。當晚討論的興趣的濃厚鼓勵我把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供全國人的討論批評。以後別位朋友討論政治，經濟，等等各個問題的文字

我們走那條路？

也會陸續發表。

十九，四，十三，胡適

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根本上抱着什麼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古人說的好：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于溝

壑。（淮南記論訓，文字依林引。）

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澈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澈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走，我們便撐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走，我們也便撐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着眼睛領導我們，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跟着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在那兒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那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我們不願意被一羣瞎子牽着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面前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並且應該走那一條路。

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于閉了眼睛讓人牽着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着更正確的途徑。

＊

＊

＊

＊

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什麼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

現時對於這個目的地，至少有這三種說法：

(1) 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2) 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者）說，國家主義的運動『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

(3) 中國共產黨現在分化之後，理論頗不一致；但我們除去他們內部的所謂史大林——托洛斯基之爭，可以說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目的地，就是『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了的筆墨官司。

我們的任務只在於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剷除的是什麼？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剷除打倒的是什麼？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走那條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這五大敵人是不用我們詳細證明的。余天休先生曾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窮線以下。張振之先生（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估計貧民數目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張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話，說，依據甘布爾，狄麥爾，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邊村的調查，中國窮人總數當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費為一三〇元至一六〇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這數目以下，便是窮人。）近來所得社會調查的結果，如李景漢先生北

『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等書所報告，都可以證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計是大體不錯的。有些地方的窮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李景漢調查北平郊外掛甲屯的結果），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民十一華洋義賑會調查結果）。這就離余天休先生的估計不遠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大敵。

疾病是我們種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殺人，肺結核花柳病的殺人滅族，這都是看得見的。還有許多不明白殺人而勢力可以毀滅全村，可以衰弱全種的疾病，如瘧疾便是最危險又最普遍的一種。近年有科學家說希臘之亡是由於瘧疾，羅馬的衰亡也由於瘧疾。這話我們聽了也許不相信。但我們在中國內地眼見整個的村莊漸漸被瘧疾毀為荊棘地，眼見害瘧疾的人家一兩代之後人丁絕滅，眼見有些地方竟認瘧疾為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病痛（我們徽州人叫他做『胎瘧』，說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于肺結核，甚于花柳，甚于鴉片。在別的國家，瘧疾是可以致死的，故人人知道牠可怕。中國人受瘧疾的侵害太久了，弄成了一點抵抗力，可以苟延生命，不致于立死，故人人都不覺其可怕。其實正因為牠殺人不見血，滅族不留痕，故格外可怕。我們沒有人口統計，但世界學者近年都主張中國人口減少而不見增加。我們稍稍觀察內地的人口減少的狀態，不能不承認此說的真確。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例如

廣州市 十七年五月到八月 每週死亡超過出生平均為六十人。

廣州市 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 每週死亡超過出生平均六十七人。

南京市 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 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週平均多死六十二人。

不但城市如此，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也很可怕。我在三十年之中就親見家鄉許多人家絕嗣衰滅。疾病瘟疫橫行無忌，醫藥不講究，公共衛生不講究，那有死亡不超過出生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第二大敵。

愚昧是更不須我們證明的了。我們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北京大學去年十二月滿三十一年，聖約翰去年十二月滿五十年，都是連初期幼稚時代計算在內。）在今日的世界，那有一個沒有大學的國家可以競爭生存的？至于每日費一百萬元養兵的國家，而沒有錢辦普及教育，這更是國家的自殺了。因為愚昧，故生產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識不夠救貧救災救荒救病，故缺乏專家，故至今日國家的統治還在沒有知識學問的軍人政客手裏。這是我們的第三大敵。

貪污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國家公開『捐官』曾成為制度，不但二十五年沒有考試任官制度之下的貪污風氣更盛行，這個惡習慣其實已成了各種社會的普遍習慣，正如亨丁頓說的，

中國人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為，文言叫做『築指』，

俗語叫做『揩油』。上而至於軍官的剋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庸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爲。

這是我們的第四大敵。

擾亂也是最大的仇敵。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廿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 (David Starr Jordan) 曾說，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神，才能够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還來不及，那能辦教育？——租稅是有些省分預征到民國一百多年的了，貪污是更明目張胆的了（半官辦的中國評論週報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論說，民國成立以來，官吏貪污更甚於從前。），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製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個大仇敵。

＊

＊

＊

＊

以上略述我們認為應該打倒的五大仇敵。毀滅這五鬼，便是同時建立我們的新國家。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

『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

安定的生活，發達的工商業，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濟制度，公共的救濟事業。『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與普及。『現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環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衛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等。

這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深信：決沒有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不能在國際上享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們不看見那大戰後破產而完全解除軍備的德國在戰敗後八年被世界列國恭迎入國際聯盟，並且特別為她設一個是期理事名額嗎？

＊

＊

＊

＊

目的地既定，我們才可以問：我們應該用什麼法子，走那一條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們一開始便得解決一個歧路的問題：還是取革命的路呢？還是走演進（evolution）的路呢？還是另有第三條路呢？——這是我們的根本態度和方法的問題。

革命和演進本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相反的。順着自然變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為變化來的急驟，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上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

也都有歷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歷史的基礎。如歐洲的『宗教革命』，其實已有了無數次的宗教革新運動作歷史的前鋒，如中古晚期的唯名論（Nominalism）的思想，如十三世紀以後的文藝復興的潮流，如弗朗西斯派的和平的改革，如威克立夫（Wyclif）和赫司（Huss）等人的比較急進的改革，如各國的君主權力的擴大，這都是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的歷史背景。火藥都埋好了，路得等人點着火線，於是革命爆發了。故路得等人的宗教革新運動可以叫做革命，也未嘗不可以說是歷史演進的一個階段。

又如所謂『工業革命』，更顯出歷史逐漸演進的痕跡，而不是急驟的革命。基本的機械知識，在十六世紀已漸漸發明了；十六世紀已有專講機器的書了，十七世紀已是物理的科學很發達的時代了，故十八世紀後半的機器生產方法，其實只是幾百年逐漸積聚的知識與經驗的結果。不過瓦特（Watt）的蒸汽機出世以後，機器的動力根本不同了，表面上便呈現一個驟變的現象，故我們叫這個時代做工業革命時代。其實生產方法的革新，前面可以數到十五六世紀，後面一直到我們今日還在不斷的演進。

政治上所謂『革命』，也都是不斷的歷史演進的結果。美國的獨立，法國的大革命，俄國的一九一七的兩次革命，都有很長的歷史背景。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館』把俄國大革命的歷史一直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農民暴動，便是這個道理。中國近年的革命至少也可以從明末敘起。

所以革命和演進只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絕對不相同的兩件事。變化急進了，便叫做革命；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性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但在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上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人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於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宣傳鼓吹，組織與運動，使少數人的主張逐漸成為多數人的主張，或由立法，或由選舉競爭，使新的主張能替代舊的制度，這是和平的人功促進。而在未上政治軌道的國家，舊的勢力濫用壓力摧殘新的勢力，反對的意見沒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運動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開活動，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決的路上去。武力鬭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夠收拾已紛亂的局勢，於是一亂再亂，能發而不能收，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如美洲的墨西哥，如今日的中國，皆是最明顯的例子。

武力暴動不過是革命方法的一種，而在紛亂的中國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於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